

论蓝鼎元的海洋经世思想

王日根 章 广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蓝鼎元是清代前期著名学者,他的著述中蕴含着丰富的海洋经世思想。他主张加强海防,肃清海盗;开放海禁,足民裕国;开发和治理宝岛台湾,增强国家的海洋防卫力量;实行海运,发展海洋贸易等。蓝鼎元的海洋经世思想是从海洋寻求发展国计民生的方法,他以海洋思维来考察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从海洋视角来寻求中国发展的方向,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 蓝鼎元; 海洋经世思想; 海防; 海禁; 海运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5)02-0038-08

The Study of Lan Ding-yuan's Pragmatistic Thoughts for Oceans

WANG Ri-gen ZHANG Gu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Lan Ding-yuan is a famous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there have abundant pragmatistic thoughts for oceans in his writings. Therefore he advocated strengthen maritime defense to round up pirates, open the maritime embargo in order to develop national economy and increase national income, and to construct navy divis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hipping and maritime trade. Lan Ding-yuan's pragmatistic thoughts for oceans are founded on the way to see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livelihood from top to bottom with oceans perspective. From the point of oceans thought he observes the encountered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china, finding out the leeway or orientation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which could meet the zeitgeist of objective requirements.

Key words: Lan Ding-yuan; pragmatistic thoughts for oceans; coastal defense; maritime embargo; shipping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福建漳浦人,清代著名学者,终生科举未中,后来选为拔贡,仅做过短期的幕友、知县与知府。蓝鼎元生于书香门第,十岁而孤,由母亲含辛茹苦抚养长大。他十岁时就通四书五经,读书涉猎广泛,“诸子百家、礼乐名物、韬略行阵,究心综核不辍”^①。年轻时不断涉足远行,十七岁时“观海厦门,泛海舟溯全闽岛屿,历浙洋舟山,乘风而南,沿南澳、海门以归”^②,后又经常往来于东南各省,因此蓝鼎元对东南沿海的疆域形胜、人文风情非常熟悉。同时,

东南地区人民丰富的航海实践和发达的海洋贸易与渔业,使他对海洋之利的认识愈益深刻。蓝鼎元少时即思“诵法先儒,心殷报国”^③,因此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脱离空谈浮夸的学风,“学适于世用,而心常存乎世道人

①②蓝鼎元《鹿洲初集·行述》,《鹿洲全集》第1册,戊辰(1988)重印光绪庚辰(1880)本。

③蓝鼎元《鹿洲奏疏·履历条奏》,《鹿洲全集》第22册。

心,词不尚浮夸,而论切中乎人情物理”^①,”其志存乎世道之人心,其心系乎生民之社稷”^②,注重寻求民生和国家发展的可行之道。康熙六十年(1721)他随族兄蓝廷珍入台湾平定朱一贵叛乱,参与战争筹划、驻防以及台湾的治理与开发,前后近两年之久,此段经历提升了他对台湾岛以及台湾岛对整个国家海洋防卫体系重要性的认识。个人的学识与经历,以及历代中国人民的海洋实践,使蓝鼎元从实际出发,形成了丰富的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经世致用思想。近来学者对蓝鼎元的教育、学术、经济、乡治等方面的思想均有研究,但是对其海洋思想的论述并不多见。除数篇论及蓝鼎元治台思想和策略之文外,仅见覃寿伟论述蓝鼎元基于海洋意识下的民本观念^③,其他研究多散见于一些相关著述之中。本文不揣浅陋,从蓝鼎元文集出发试述他的海洋经世思想。

一、加强海防,整肃海盗

清王朝统一全国后,康熙皇帝弛海禁,东南海上相对平静,没有发生海盗大规模抢劫和反官府的事件^④。但康熙中后期小规模海盗劫掠再次兴起,据统计,仅1708—1717年之间,涉及海盗的奏折共计80余件^⑤。这还只是上报朝廷的数目,未上报的应该还很多。海盗劫掠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地区,每年“二三月至九月,皆盗艘劫掠之时”,“而往往不能廓清,岁岁为商民之害”^⑥。海盗初起时只是少数几个人潜伏港口劫夺渔民,随着势力的发展,“便敢公然行劫,此粤东所谓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则乱流以截之,稍近则大呼落帆,商自度无炮火军械,不能御敌,又船身重滞,难以走脱,闻声落帆,惟恐稍缓,相顾屏息,俟贼登舟捆缚,贼或收其财物,将船放回,或连船劫驾他往。”^⑦但与明末清初职业性大海盗集团不同,这些海盗大多是“饥寒逼身,犯法潜逃,寄口腹于烟波浩荡之际”的贫民^⑧。康熙自己也认为“盖海贼原无窝巢,初时不过数人,或系穷民,或为水手,其力不能自备船只,亦无器械,因饥寒所迫抢夺营伍及商贾之船只器械,渐次啸聚,久而势众。又苦无米粮,乃往来海洋肆行劫掠。”^⑨而“在洋之盗,十犯九广”,大部分上是来自广东地区,尤其是粤东与粤西地区。这些地区山多民贫,民风剽悍,地方官也无可奈何,“半以攘夺为生涯,水务习熟,往来如飞,而广、惠、肇、高深山聚处之民,往往集众操戈,载大纛以出,剽掠富商大贾,地方官不敢过问,或家人衙役为其所擒,黥面馘耳,亦佯为不知而姑息焉。”^⑩贫民为生计铤而走险剽掠海洋,是海盗产生的根源。康熙朝禁止商船携带军火器械,商人遇到海贼时缺乏基本的自卫能力,只有“相顾屏息,俟贼登舟捆缚,贼或收其财物,将船放回,或连船劫驾他往”^⑪。

海防懈怠、军队战斗力低下也是海盗的兴起主要原

因。康、雍时期,“承平日久,将卒疲玩,大帅养尊处优,不肯轻身出海。将弁奉命巡哨,泊船近岸,沉湎樗蒲,以为娱乐,迁延期满,扬帆回汛。贼伙连踪劫掠,莫过而问。或上命督责,不得已稍稍出洋,则大张声势,扬旆徐行,又于舟中旦暮鼓乐,举炮作威,惟恐贼船不知远避。贼亦若相体谅,不来冲突,自于他处行劫。俄而失事之处,偶属他镇地方,则此镇自相庆贺,以为贼不敢犯吾境。是则今日沿海水师之通病也。”^⑫即使出师巡哨,“坐守数月,及瓜而还,罕有离岸十余里试出海面优游者。商船被劫,虽城下亦谗之外洋,虽营边亦移之邻境。彼此互推,经年不倦,若其海菜鱼虾,微利所在,战胜攻取,如临大敌。”^⑬水师的懈怠和遇事推诿、遇利争夺,使海防形同虚设,无异为虎作伥,更使盗贼出入如履平地。此外,康熙后期,“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无人,民逸居而无教,官吏孳孳以为利藪,沉湎樗蒲,连宵达曙。本实先拨,贼未至而众心已离,虽欲无败,弗可得已”^⑭。官军士气皆无,沉迷享乐,无怪乎朱一贵叛乱时“不旬日间,全郡陷落”。因此,整顿加强海防,提高军队战斗力,肃清海盗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严峻问题。

海盗的兴起也引起康熙帝的注意,但他仍坚持“防海之道,惟在陆路兵弁,守御严紧,乃为扼要”,要求各地督抚提镇加强陆路的防守和稽察,靠陆地军队消灭劫掠的海盗,“今沿海地方督抚提镇,能用心防御,不时稽察,使贼无所掠夺,则不期灭而自灭也。……是知沿海防汛,果能严肃,贼一登陆,便成擒矣。此防海之策,为陆路守御最为要也”^⑮。康熙的主张对登陆劫掠的海盗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对在洋劫掠的海盗以及消弭海盗形成的各种原因是毫无效果的。蓝鼎元则针对海盗兴盛的原

①蓝鼎元《东征集·王者辅序》,《鹿洲全集》第14册。

②蓝鼎元《鹿洲初集·旷敏序》,《鹿洲全集》第1册。

③覃寿伟《海洋视野下蓝鼎元的民本观》,《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

④郑广南《中国海盗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

⑤参见王华锋《18世纪初期(1708—1717)的海盗问题初探》,《兰州学刊》2007年第3期。

⑥⑦⑧⑩⑪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论海洋弥捕盗贼书》,《鹿洲全集》第1册。

⑨⑬《清圣祖实录》卷253,康熙五十二年正月辛丑,中华书局1985年版,《清实录》第6册,第502、502—503页。

⑫蓝鼎元《鹿洲初集》卷2《与荆璞家兄论镇守南澳事宜书》,《鹿洲全集》第1册。

⑬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2《潮州海防图说》,《鹿洲全集》第6册。

⑭蓝鼎元《平台纪略》,《鹿洲全集》第23册。

因,提出了许多治理海盗的措施:

(一)“驰商船军器之禁”,使商船可以有一定的武器装备抵御盗贼。武器装备是保证商船安全航行的重要条件,但在康熙三十三年(1684),清政府就严禁出海船只携带武器。康熙五十九年(1720)又重申“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军器概行私带者,照失查鸟枪例罚奉一年”^①。雍正六年(1728),罪责有所放宽,但仍规定“鸟枪不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二十斤”^②。雍正八年(1730)又放宽到每船带炮不得过二门,火药不得过三十斤。这些限制严重削弱了出海船只的自卫能力,使商船遇到盗贼劫掠时毫无抵御能力,海上航行的风险自然加大。

蓝鼎元生长于海洋经济贸易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对出洋商民有深入的了解。他指出“商船皆有身家,断不敢思为匪,以自丧其身家性命。而且一船下水,必有族邻乡保具结,地方官查验烙号,结与护船牌照,方敢外出贸易。此等有根有据之人,岂不可信,而必禁携枪炮,使拱手听命于贼。若以族邻保结不足凭,则不应给与牌照。既可给与牌照,则可听其随带防船器械。倘得请旨勿为拘牵,驰商船军器之禁,则不出数月,洋盗尽为饿殍,未有不散伙回家者也。”^③在清王朝严格限制和规定下,出洋商船必须家族邻里具保,官府查验给照,跟随商船出洋的客商和舵手也都要严格登记,载明船照,以便稽查。“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④。出洋商民多是迫于生计飘流海洋,为了生计和家族邻里身家性命,他们断不敢轻易为非作歹。因此,蓝鼎元吁请清政府放开商船携带军器的禁令,使商船在遭遇海盗劫掠时有最起码的抵御自卫能力,而海盗因劫掠不能得逞,衣食无着,只有散伙回家,可谓不攻自破,一举两得。

(二)针对海防懈怠,军队战斗力低下,蓝鼎元提出了“练兵丁、选死士、精器械、慎机密、搜丑类而歼之”^⑤的加强海防策略。他在《与荆璞家兄论镇守南澳事宜书》中具体提出:一哨船之接济宜察也;二兵丁老弱宜换也;三亲随之精锐宜选也;四哨船之军器宜审也;五巡哨之踪迹宜密也;六驭下之恩威宜兼济也等六项策略^⑥。盗贼之所以能长久不衰,乃是因为内地奸人粮食、炮火军械的不断接济,而这些奸人大部分就是巡哨兵丁。因此镇主当留心稽查,肃清内奸。海防水师兵丁老弱参半,一些膏粱子弟也厕身行伍,赌博生事,逃避差徭。老弱兵丁准许推举余丁自代,但不过问其真假,只要人材精壮、武艺高强,不能举荐替代的则清除出军队,改募勇武有力的士兵取代。另外在军中挑选武艺才能出众的三百人作为巡哨亲军,又在这些人中选拔五六十人为亲随兵丁,加以优待,使巡哨及战时有相当的可靠力量。海防还须舍弃陆战兵器形式,哨船军器“专用鸟铳、鹿铳、连环子母西

瓜等炮、喷天筒、火罐、火箭,佐以单刀、藤牌、长枪、大钩,而其余一概不用。约略一船中,为炮火者十之七,为刀枪者十之三”^⑦。对于以往巡哨在近岸游弋玩乐,不出海巡视稽查的情况,蓝鼎元认为应该增加士兵出海巡哨的次数以及改善巡哨的方式。哨船出巡时可以伪装成商船“勿张旗帜,勿挂牌刀,多运小石压载,以疑货物,有急可当军器。行莫连,但度策应所可及,若断若续,遇贼船对敌,然后举大炮为号。众哨齐集,堵截环攻,擒贼获船,百不失一”^⑧。此外,驾驭士兵应当恩威并济,“御兵之法,莫大乎体贴人情,为之设身处地,饥寒疾苦,痛痒相关,婚姻死丧,酌量周恤,上下相亲,如手足腹心之不可离。至于法令一出,泰山不移,敢有犯者,虽亲无赦”^⑨。整顿后的海防水师才能改变以往将卒懈怠,不敢出洋巡哨、避贼如虎的状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海防实力,“知所向之无敌也”^⑩。当然,蓝鼎元加强海防的策略的出发点是提升整肃海盗的能力,为海洋贸易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三)课农桑,发展社会生产;兴教化,移风易俗。“练兵丁、选死士、精器械、慎机密、搜丑类而歼之,治其标也。平日恩威并济,必有大服军士之心,虽使赴汤蹈火,亦无所避,又当知弥盗之源在乎民风。士习课农桑,修学校,以养以教,自然不为盗贼,治其本也。”^⑪贫困是海盗产生的根源,因此治理海盗的根本还在于发展社会生产,推行教化,转变民风,消弭盗源。“用兵之道,安民为先,弥盗之源,抚民为本”,因此蓝鼎元认为对于沿海边民以及岛屿民众不能只以弹压或迁移为主,而应当根据地理条件,发展生产,兴王教,体恤民情,“米价腾贵,运载平糶;雨暘不节,斋戒祷祈。又以春秋巡行阡陌,课农桑,择其勤者奖励之。悦色和颜,如家人妇子之相亲切”;每月朔望时聚集兵民,宣讲圣谕十六条,推行王道教化,使兵民“晓然于圣天子轸念民生谆谆教诲之意,而相戒相勉,不敢作奸犯科,亦经理海疆之要务,使民无盗之原也”;同时兴举义学,扩充学校,使诸生及兵民子弟能够入校学习,使兵民“虽在海外,不废诗书;虽有戈矛,必兴礼乐”^⑫。如是,地方社会生产发展,学校兴盛,教化风行,一地的风气必由此转变,这就清除了海盗产生的根源。

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20《海防处分例》,光绪十二年(1886)刊本。

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29《绿营处分例》。

③⑫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论海洋弥捕盗贼书》,《鹿洲全集》第1册。

④蓝鼎元《鹿洲初集》卷3《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全集》第2册。

⑤⑥⑦⑧⑨⑩⑪蓝鼎元《鹿洲初集》卷2《与荆璞家兄论镇守南澳事宜书》,《鹿洲全集》第1册。

“国家东南环海,万里汪洋,舟楫利涉,为民生之大利”^①,但海盗的横行破坏海洋贸易,使商民深受其害。蓝鼎元十分重视海洋贸易,希冀盗乱平息,为海洋贸易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使海洋贸易顺利发展,维护和促进“民生之大利”。蓝鼎元不是说书先生,他在任潮阳知县时亲自实践,剿灭黄吕璜、方阿球等两股海盗势力,“自是山陬石罅,海澨游魂,无不闻风丧胆,潜踪远遁,莫敢有复萌攘窃多事之想者。潮普两邑肃然矣”^②,沿海治安形势得到根本好转^③。

二、开海禁,足民裕国

清初为剿灭明郑抗清力量及海盗集团,实行严厉的海禁、迁界政策,“凡沿海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一贼登岸”^④。禁海、迁界使东南沿海地区遭受灭顶之灾。康熙十九年(1680),福建总督姚启圣曾言“照得边海地方播迁,百姓抛产弃业,流离失所者二十年矣。朝廷正供以徙界缺额者四百余万两。”^⑤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水师收复台湾,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第二年三月,康熙允许浙、闽、粤援山东例,听百姓海上贸易与捕鱼,九月发布谕令,正式宣告“开禁”,“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份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⑥康熙虽然实行“开海贸易”,但“胸中横亘着对汉人无法消解的猜疑和防范”^⑦,在人民自由出海、商品出口、出海船只、商船武器装备等方面进行严格限制^⑧。康熙认为汉人人心不齐,难以全部服从满清的统治,甚至害怕汉人勾结西洋人威胁统治,告诫满洲贵族像防范西洋国家的威胁一样防范汉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汉人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⑨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借张伯行奏商人偷米出洋之机,颁布了“禁南洋贸易令”,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准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⑩。禁止南洋贸易对东南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花费数千金建造的远洋海船只能维系在荒郊港口,折价变卖无主,拆梁改造又心有不甘,眼见其朽坏,然而“一船之散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无聊之状,皆因洋禁”与“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⑪。

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⑫文中论述了开海贸易

的重要性:首先能发展社会生产,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缓解社会矛盾,“沿海居民,造作小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使“闽广家给人足”。其次可以互通有无,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增加国家关税与财政收入,“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财货,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欲国,其利甚为不小”。学者对于这一观点给予很高的评价,“这种提法把对外贸易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两方面的作用联系起来,而且认为足民(即发展经济)是裕国(即增加国家收入)之本。这一论点超越了单纯的财政眼光,比丘濬‘不扰民’而‘足国用’的认识也更积极,更深刻”^⑬。最后,开海贸易可以解决国内粮食紧缺问题。“闽广产米无多,福建不敷尤甚。每岁民食,半藉台湾,或佐之以江浙。南洋未禁之先,吕宋米时常至厦,番地出米最饶,原不待仰食中国”。清王朝厉行海禁导致正常贸易受阻,沿海失业生民入海走私劫掠,甚至勾结西方殖民者为害中国,防盗反而导致盗乱丛生,“禁南洋有害而不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蓝鼎元主张开放南洋海禁,允许生民进行海洋贸易,繁荣社会经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足民者裕国”才是发展国计民生与维护社会发展稳定的根本。

①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论海洋弥捕盗贼书》,《鹿洲全集》第1册。

②蓝鼎元《鹿洲公案》卷上《葫芦地》,《鹿洲全集》第9册。

③参见王亚民、任艺《清初知县蓝鼎元与潮普地区海益治理》,《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76《兵律关津》。

⑤姚启圣《闽颂汇编(四)》,忧畏轩文告,禁止派扰复业,载《台湾文献汇刊》第2辑第4册,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⑥《清圣祖实录》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甲子,《清实录》第5册,第212页。

⑦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⑧参见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338页。

⑨《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清实录》第6册,第650页。

⑩《清圣祖实录》卷271,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清实录》第6册,第658页。

⑪⑫蓝鼎元《鹿洲初集》卷3《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全集》第2册。

⑬赵靖《简论蓝鼎元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问题》1983年第5期。

康熙时期,清王朝面对的国际形势相对宽松,也有利于开海贸易。中国沿海邻国除日本势力较大外,南洋诸国、朝鲜、琉球都势力较小,而且“南洋数十岛番则也,开辟以来,未尝侵扰边境,贻中国南顾易患,不过货财贸易,通济有无”^①。南洋诸国势力弱小,对中国不构成威胁,且早已和中国进行朝贡贸易,民间贸易也很早就繁荣起来,沿海许多民众主要靠往来南洋贸易养家糊口。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是西方殖民势力和日本,但是“今日本不禁,红毛不禁,西洋天主教布满天下,且以广东澳门为彼盘踞聚族之区,而独于柔顺寡弱、有利无害之南洋,必严禁而遏绝之,是亦不可以已乎?”^②因此,禁止中国人民前往南洋贸易,于情于理都是行不通的。

至于“疑洋商卖船与番,或载米接济异域,恐将来为中国患。又虑洋船盗劫,清禁艘舶出洋,以省盗案”的人,被蓝鼎元斥之为“迂谬书生”纯粹“坐井观天之见”,是在朝九卿“未身历海外,无能熟悉”情况下提出的无知之见,并有力地驳斥了“卖船与番”及“载米出洋”等谬论^③。中国所造船只价高质低,“即以我船赠彼,尚非所乐,况令出重价以买耶”;南洋诸番产米最多,价格低廉,时常运至厦门出售,若洋商载出销售,“洋船所载货物,一担之位,收船租银四五两,一担位之米,所值几何”^④。从利害关系、国际形势来看,南洋贸易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蓝鼎元大声疾呼“南洋诸番不能为害,宜大开禁纲,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此岂容缓须臾哉!”^⑤

蓝鼎元不是封疆大吏,他的主张很难上达到满清统治者手中。但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最终下决心弛南洋海禁,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奏议所打动^⑥。高其倬在雍正四年(1726)上疏称“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余利归贍家属。曩者设禁例,如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如虑漏消息,今广东估舟许出外国,何独严于福建?如虑私贩船料,中国船小,外国得之不足资其用。臣愚请弛禁便。”^⑦高其倬为闽浙总督,蓝鼎元与他是否有交往还不得而知。但是,“将高其倬奏折与《论南洋事宜书》相互比勘,从中不难发现高折实以后者为主要依据。如果说高其倬(或为他办折稿的幕宾)看过《论南洋事宜书》,并倾心接受了蓝鼎元的政见,恐怕不是无稽之谈。”^⑧因此,蓝鼎元的主张还是间接的为雍正时期开放南洋海禁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筹划治理、开发宝岛台湾

“台湾一郡,不但为海邦之藩篱,且为边民之厩仓”^⑨,台湾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明末以来就是西方殖民列强觊觎的对象,并先后沦为西班牙和荷兰人的殖

民地。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率领 2.5 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郑成功在台湾地区重视土地开发和兴修水利,利用台湾有利条件发展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水师收复台湾,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清王朝收复台湾后,曾廷议欲虚置其地,遭到施琅的坚决反对,最后议定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

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在台湾叛乱,蓝鼎元作为幕僚跟随其族兄蓝廷珍参与平定叛乱。蓝鼎元对台湾地形胜了如指掌,“决机料敌,往往如神”^⑩,叛乱七天就被平定。之后,他还参与筹划台湾的驻防、治理与开发,前后近两年之久,对台湾的情况更加了解。蓝鼎元对台湾在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海国之台湾,乃王家之屏翰,地则龙蟠虎踞,屹立扶桑暘谷之间。门开鹿耳、鯤身,遥扼吕宋、荷兰之吭”^⑪“台湾海外天险,治乱安危,关系国家东南甚巨。其地高山百重,平原万顷,舟楫往来,四通八达。外则日本、琉球、吕宋、噶罗巴、暹罗、安南、西洋、荷兰诸番,一苇可航;内则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辽阳,不啻同室而居,比邻而处,门户相通,曾无藩篱之限,非若寻常岛屿郡邑介在可有可无间”^⑫。台湾对于东南半壁乃至整个国家都有重要的战略作用,蓝鼎元十分重视和强调台湾的治理与开发。

(一)主张在台湾兴办教育,行国家教化,转变民风。台湾民众好争讼、好动公呈,常引起争执斗殴祸端;又好奢侈,“家无斗米,服值千缗,饘粥弗充,槟榔不离于口”;鸦片传入之后,“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又赌博猖獗,“兵民皆然,废事失业”^⑬。民风剽悍不古,必须扭转,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兴办教育。“台湾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兴学校,重师儒,自郡邑以至乡村,多设义学。延有品行者为师,朔望宣讲圣谕十六条,多方开导,家喻

①②③④⑤蓝鼎元《鹿洲初集》卷3《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全集》第2册。

⑥⑧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⑦《清史稿》卷292《高其倬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03页。

⑨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2《福建全省总图说》,《鹿洲全集》第6册。

⑩蓝鼎元《东征集·王者辅序》,《鹿洲全集》第14册。

⑪蓝鼎元《东征集》卷1《六月丙午大捷攻克鹿耳门收复安平露布》,《鹿洲全集》第14册。

⑫蓝鼎元《东征集》卷3《复制军台疆经理书》,《鹿洲全集》第15册。

⑬蓝鼎元《鹿洲初集》卷2《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鹿洲全集》第1册。

户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转移士习民风,斯又今之急务也。”^①蓝鼎元提出在府城设立书院,在县城设立义学,使生童知诗书礼节、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身心性命之理,使知孝弟忠信”^②,用理学思想给他们灌输为人之道,逐步转变士民风气;对于普通民众则宣讲清王朝颁行的圣谕,推行社会教化,达到社会治理的作用。兴教育、行教化、变民风是作为一个经世致用的儒家知识分子的蓝鼎元实行社会治理的主要措施,在当时情况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用。

(二) 放宽政策,允许妇女、家属渡台。“台民素无土著,皆内地作奸逋逃之辈,群聚间处,半闽半粤”^③,渡台客民少有家眷,“无父母兄弟宗族之累”,因此往往滋扰生事,或聚众斗殴,或为盗贼,扰乱社会秩序与治理。蓝鼎元主张放宽渡台政策,允许妇女家属渡台,使渡台客民有妻室家眷,实际上就是使客民受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安心务农与照顾家眷,不敢随意擅起祸乱,消弭祸端。“凡民人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取完聚者,许具呈给照,赴内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难。凡客民无家眷者,在内地则不许渡台,在台有犯務必革逐过水,递回原籍。有家属者,虽犯,勿轻易逐水,则数年之内,皆立室家,可消乱萌”^④。“盖民生各遂家室,则无轻弃走险之思。设有不肖,欲为盗贼,不能不念妻子亲属之株连。而且一妻入门,则欲食欲衣,有子有女,则衣食日繁,不得不力农负贩,计图升斗,以免妻子一日之饥寒。虽有奸豪意气,亦将销磨净尽,此不待禁令而自然驯服者也。”^⑤客民有家室,可以潜移默化的解决台湾社会乱象问题。

(三) 重视台湾的开发。其一,在台湾地区推广农桑。台湾土地平旷,适合种桑植棉,“可令民于内地收其核,赴台种之。并令广种麻苧,织纆为冬夏布。”推广农桑,可以使民人更多时间从事耕作、纺织,减少民人社会游荡时间和社会动乱因素,并且使妇女“有蚕桑纺织之务,则勤俭成风,民可富而俗可美也”^⑥。其二,均平赋税,减轻民人负担。台湾税赋按照戈甲征收,比内地重很多,“上则每年征粟八石八斗,谷价贱时,每石三钱,是每甲征本色银二两六钱四分,较内地加倍;若谷贵,则不堪矣。或有虐今折色,每石七钱,则又倍之倍矣。……然台邑地方狭窄,不比凤诸台邑,民亦将不堪重赋矣”。但是又不能轻易丈量土地,免起祸端,“若有意丈量,则需合台、凤、诸三邑酌量匀配,勿致偏枯,方为尽善,万万不可加赋”。^⑦其三,鼓励开垦荒地。台湾仍然有很多荒地,“宜令民开垦为田,勿致闲旷。前此皆以番地禁民侵耕,今已设县治,无仍弃抛荒之理”^⑧。同时也允许土番自行开垦土地,土番不愿开垦的地区则任凭民人开垦耕种。其四,加强对土番的管理。土番是台湾的原住民,虽然“顽蠢无知,近亦

习为狡伪”,但是经常作乱的“通共逆番不过二千人”,因此对土番应该区别对待。对于顺服土番,“宜大张文告,慰谕台中善良,各安生业。军士经行地方,不许妄动民间一草一木,无骚扰惊惶之患”,使他们安居乐业;作乱土番则“严饬将弁奋勇扑灭,克限一月为期,务必荡平清廓”^⑨。至于内地好杀生番,则毁灭他们的藏身之所,任由民人开垦,或者用炮火驱赶,或者“以番和番,招徕归顺。招徕即久,渐化渐多,将生番皆熟,是又为朝廷扩土疆,增户口贡赋也”^⑩。蓝鼎元对待土番的策略其实是封建王朝对待少数民族的一般做法,其愿意归附的则以臣民待之,不愿归附的则以“蛮夷”视之,甚至不惜武力屠戮。

(四) 加强台湾的防卫。台湾地处东南,“海外天险”^⑪,对整个国家海洋防卫体系至为关键。蓝鼎元主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台湾防卫:其一,构筑城墙壕沟体系,巩固台湾岛的防卫。“筑城凿濠,台中第一急务,当星速举行者也”,城壕“合文武衙署、仓库、监房包裹在内,乃可战可守”,战略意义重大^⑫。在平定朱一贵叛乱后,蓝鼎元主张在台湾所有府县构筑坚固城濠,并特此致书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澄清利弊,“此事关系台疆安危,即系国家东南沿海治乱,似不可苟且涂饰,惟执事留意焉”^⑬。其二,加强台湾的水陆兵防。蓝鼎元为加强台湾水陆兵防,做了周密的计划:在北路“全台腹背旁门要害”的鸡笼修补炮台城,添设鸡笼水师一营增强守备,与淡水营形成犄角之势,在淡水以南的地区增设墩台,设千把总防守。在北线荒芜地区募民屯田开垦,设置村落,防范生番,辅助北路的兵防。中路的罗汉门是“南北往来要害”的战略要地,朱一贵在罗汉门叛乱,后来剿掠距台湾府三十里的岗山。朱一贵叛乱平定后,在岗山添设守备,罗汉门却弃置空虚。“岗山去府治三十里,上有总镇标兵,下有南路参将,似无庸特设守备”,蓝鼎元认为应该将岗山营守备移驻罗汉门,这样“贼巢永绝,而番害亦可去除”^⑭。南路至淡水以下的大崙麓、琅塙二三百里,是番民聚集的地方,也是“台南要害”,没有兵防,“今开垦流移日趋日众,山深海僻,遂为匪类逋逃之藪”,主张

①蓝鼎元《东征集》卷3《复制军台疆经理书》,《鹿洲全集》第15册。

②④⑥⑦⑧⑩蓝鼎元《鹿洲初集》卷2《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鹿洲全集》第1册。

③⑤蓝鼎元《鹿洲奏疏·经理台湾疏》,《鹿洲全集》第22册。

⑨⑫⑬蓝鼎元《鹿洲初集》卷3《上郝制府论台湾事宜书》,《鹿洲全集》第2册。

⑪⑭蓝鼎元《鹿洲奏疏·台湾水陆兵防疏》,《鹿洲全集》第22册。

在此招募农民为兵,设屯田守备一营,“屯垦防守”,使盗贼渊藪“收为兵食,利国利民,一举两善”^①。

蓝鼎元还主张在台湾实行保甲法,反对迁移划界,也反对将台湾镇移往澎湖的做法。“均赋役、平狱讼、设义学、兴教化,奖孝弟力田之彦,行保甲民兵之法,听开垦以尽地力,建城池以资守御,此亦寻常设施耳。而以实心行实政,自觉月异而岁不同。一年而民气可静,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礼让可兴,而生番化为熟番,熟番化为人民,而全台不久安长治,吾不信也。”^②蓝鼎元顺应台湾历史发展的需要,在清政府消极经营台湾时,提出了一些关于积极经营台湾、推动台湾开发事业的远见卓识^③,“遂使海疆耄定,边圉奠安。较之古者方召管葛之经济,又未知相去何如也”^④,因此被盛誉为“筹台之宗匠”^⑤。

四、发展海运 裕国裕民

清承明制,建立漕运制度,由运河运送粮食物资北上,但清代漕运存在许多制度性缺陷,“人人以为大,人人以为难”^⑥。蓝鼎元也看到在山东、北直隶一带“运河水小,输挽维艰,有剥浅之费,有挨次之守。军夫终日牵挽,行不上数十里,其力甚劳而费甚巨,大抵一石至京,糜十石之价不止”^⑦,可谓劳民伤财,事倍功半。海运是最方便、便宜的运输方法,也是发展海洋贸易的便捷桥梁,为国家长远利益着想,蓝鼎元撰写《漕粮并兼资海运疏》^⑧,建议发展海运:

(一) 分析施行海运的可行性。首先,从历史实践来看,元代已经证明海运是可行之良法。“海运之法,在元朝行之已有明验……初岁运四万余石,后渐增至三百余万,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元史以为一代良法。”其次,从事海洋贸易的闽广商民也能证明海运确实可行。闽广海洋贸易发达,商民视海道为坦途,蓝鼎元“生长海滨,习见海船之便利,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驾,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至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来往往,岁以为常”。再次,海运的损失较小,“匀配各船,每石所少无几,或七八升,或三五合,止有一次少至二斗四升,以为大异,其视河漕之数,尚所得多”。并由此断定“海运之法,在今日确乎可行”。

(二) 为海运的施行做了周密的策划。首先,试行阶段,由专任官员雇闽广商船拨运苏淞漕粮到天津,再用小船转运到通州,将运费与漕运相比较,若可行就将江南浙江沿海漕粮改用海运。其次,施行阶段,蓝鼎元把发展海运相关的各个方面如督运水师、起运时间、使用船只、路线等都做了详细计划。特设总督海运大臣一员,驻扎上海崇明等地,兼督三省水师军务,将江南、浙江、山东水师官兵统筹调遣巡哨诸洋,专门负责三省海洋盗案。同时

裁撤崇明总兵官,改设海督标中军副将一营,左右前后游击四营,负责押运漕粮。海运大臣和海督水师的设立,可以保证海运的安全和有序发展,是发展海运的必要举措。海运时间以二月半春分前后至八月止。海运使用的船只,主要有三种:其一是闽广赶缙船,这种船样式大经风浪,适合大洋航行;其二是江南沙船,这种船载量多,但用布帆,只可顺风驾驶,逆风则寸步难行;其三是台湾舢板船,舢板船样式短阔,可以载六七百石,吃水不深,轻快便捷,“不论内洋外洋,不论风涛顺逆,俱可无虑。欲运漕粮数多,此船似不可少”。所有船只在江南开厂制造,招募闽广舵工水手,给予军粮,令其驾运。海运船只还需配备一定的武器装备,“每船安置大炮子母炮数位,鸟枪、火药、搭钩、牌刀足用,若遇贼船,便可顺手擒获。”此外,海运船只除运载漕粮外,应留出一定空间搭载舵工水手的私货,“体其情而恤其劳,自无不踊跃从事”,在空船返回时还可运载北方货物回南方,如此“上下海关,俱可多征税课,尤裕国裕民之道也”。允许运船搭载私货以及空船载运北方货物返航,促进南北商品流通,与蓝鼎元发展海洋贸易的主张相一致。他主张发展和促进民间航运与贸易的发展,“天下舟楫之利,无如闽广。而江南则逊浙江,山东又逊江南。海洋万里,不啻同室,天下之船,皆可直抵山东。日本、琉球亦不过一水之便。”可见,蓝鼎元发展海运的主张不仅是转运漕粮,还是为发展海洋贸易提供便捷桥梁,使海运与海洋贸易相互发展。海运路线因使用的船只不同而不同,使用赶缙船“由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尽山花鸟,在五沙头直放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经刘公岛、登州沙门岛、莱州大洋,入界河,以至天津”。赶缙船样式大底尖,适合外洋航行,而江南沙船入水浅不经风浪,只适合内洋航行,一般也由崇明出海,沿内洋航行。

蓝鼎元发展海运的思想主要是将强大军事力量保护的海运与海洋贸易以及国家海防三者结合起来。“海运

①蓝鼎元《鹿洲奏疏·台湾水陆兵防疏》,《鹿洲全集》第22册。

②蓝鼎元《平台纪略》,《鹿洲全集》第23册。

③李非《试论蓝鼎元对清初开发台湾的贡献》,《福建论坛》1985年第3期。

④蓝鼎元《绵阳学准·郑发祥后序》,《鹿洲全集》第11册。

⑤谢金奎《蛤仔难纪略》,清道光甲午(1834)二勿斋重刊本。

⑥包世臣《安吴四种·中衢一勺》卷1《自序》,清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

⑦⑧蓝鼎元《鹿洲奏疏·漕粮并兼资海运疏》,《鹿洲全集》第22册。

最为便捷,节劳省费,而向来无有筹及者,一则由不知海道,一者畏风涛漂溺,一则虑在洋盗劫。今数者俱可无虞,且不特粮艘宴安,凡商民皆蒙其福,是诚可行者也。况舢板头船一设,可以无处不入,天下岛澳险阻,皆坦然在掌握之中。是海督水师甲于天下,而京东有万里金汤之势矣。”蓝鼎元的海运思想解决了海运发展的各个难点,而且海督水师的设立除保护海运和海洋贸易的顺利发展外,还可以增强对海运航线及其海域的控制能力,提高国家的海防实力。清王朝设立了天津水师,“若再行海运,设海督,联合山东、江浙为京东一大水师,内可以廓清洋盗,外可以镇压诸彝;上可以飞挽漕粮,下可以流通百货。联合沿海各省水师成为控制中国海域的强大军事力量,可以打击海盗和日渐增长的西方侵略势力,为发展海运与海洋贸易提供有力保障,维护和推进国家的海洋安全与海洋权益。因此,蓝鼎元倡议设立的大水师,已经不是传统的负责“缉私捕盗”的沿海水师,而是赋予保护和促进海运与海洋贸易发展,增强对海运与贸易航线及其海域的控制能力,保护国家海洋权益与安全任务的新式军种,具有近代海军的职能。更进一步说,蓝鼎元设立海督水师和发展海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制海权思想意识的体现。“海权论”的奠基者马汉认为,海军的出现是由于平时有海运;有武装力量保护的海运极大的影响海权的发展,是决定滨海国家的历史和政策的关键之一^①。有研究者就认为蓝鼎元的主张与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十分相似,区别在于一个是适应海外扩张的侵略理论,一个是有效控制国家近海区域安全^②。蓝鼎元的“理论素养及战略眼光在当时极为先进,惜未被朝廷采纳”^③。

五、结语

清初,东南海域有郑成功的顽强抵抗,西方的殖民侵略也日渐端倪,因此如何对待海洋成为满清王朝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由于军事和政治需要,清初厉行海禁,“以禁为防”与“重防其出”相结合。在收复台湾后,海禁解除,但“禁海”思想的幽魂仍然盘绕在庙堂之上,不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④。蓝鼎元生长在海滨,耳濡目染使他深谙海洋对于发展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当许多人固着海洋“为至切之患”^⑤思想的时候,他认为海洋是中国“民生之大利”,开发和利用海洋可以改善民生,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地方精英,蓝鼎元的思想渗透着强烈的民本意识,而身为传统儒家分子,他的思想又包含报国之志,因此他的海洋经世思想是以发展民生为基础,把国计发展结合起来,兼顾民生与国计的利益,最终达到

“裕国裕民”的目的。这就突破了许多论者重民生或重国计的偏颇。蓝鼎元的远见卓识还在于,他把清海盜、开海禁、开发岛屿、发展海运等多方面结合起来,综合开发和利用海洋。加强海防,肃清海盜,维护海洋开发和海洋贸易的良好环境;开放海禁,创造商民开发利用海洋的政策基准和条件;开发和治理宝岛台湾,进一步巩固国家海防,使台湾成为国家海洋开发和海洋安全的重要基地;建设水师,发展海运,同时发展国内的海洋贸易,此“尤裕国裕民之道也”。

蓝鼎元是具有海洋思维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以海洋思维来考察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从海洋视角来寻求中国发展的方向,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他的思想比同时代许多学者更具远见卓识,有些方面甚至近代思想家林则徐、魏源等人还不及^⑥。但是清王朝专制统治下“海疆管理政策的核心是对民众的管理,而忽略了对辽阔的海洋国土和沿海岛屿所蕴藏的富饶资源的潜在商机的开发的管理”^⑦,蓝鼎元的思想和主张不可能完全被接受和采纳,最终没有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当前我们正在积极建设海洋强国,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蓝鼎元的海洋经世思想应该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13&ZD09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日根(1964—),男,江苏兴化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广(1988—),男,江西萍乡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郝红暖

①[美]A. T. 马汉著,安常容、成忠勤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②④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20页。

③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⑤道光《福建通志》,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1757页。

⑥赵靖《简论蓝鼎元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问题》1983年第5期。

⑦刘庆《论明清之际中国海疆政策的失误》,《郑和研究》2000年第1期。